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

傅　吉　庆

抗日战争所形成的正面与敌后的两个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成功体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两个战场对抗日战争进程和结局，乃至战后中国政局和中国前途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深入探讨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正确评价两个战场对夺取抗战胜利的伟大作用，科学总结两个战场的历史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战争史上的伟大创举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战争现象以来，战争双方正面对抗，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一场战争同时在几个地区或几条战线上进行，也史不乏例。战役、战斗的迂回包围，两面夹击，更是司空见惯。然而，一场战争同时在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上进行，而且敌后战场如此广大，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策应，既有统一战略目标，又各自独立自主，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是少见的，这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创举。

两个战场的形成，因素诸多，择其要者：

（一）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大国中，唯独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是不统一的。这对抗战是不利的。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和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和军队得以在统一的战略目标下，共同抗日；但由于历史上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立和阶级利益的不一致性，特别是国民党顽固派居心叵测，借“统一合作”,阴谋取消、削弱我党我军,甚至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我党我军，因而又使共同抗战出现了复杂局面。我党我军为了生存、发展以利抗战，不能不实行统一战略下的独立自主原则，以高人一筹的胆识和韬略,“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敌后战场,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变对抗战的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二)有其战略上的必要性。由于敌强我弱,使我处于劣势和被动的战略地位。要转变敌我的优劣形势，发扬我地大人多的优长，变战略上的内线为战略上的外线，变战略上的被包围为战略上的反包围，以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致敌于死命，必须构成对敌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

(三)有其客观的可能性。敌之侵略的野蛮性,我之反侵略的正义性,必定唤起我同仇敌忾,实行全民族抗战。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必定顾此失彼，使我有隙可乘，因而我可以在敌占区内开辟第二战场，构成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

(四)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把可能变成现实,需要经过主观努力。正面对抗是战争双方通常采取的战争形式。抗日战争正面战争是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地位造成的。这是无从选择和无须创造的。而敌后战场则不能自然形成。是靠战争指导者,在客观可能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创造,去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分析敌我双方诸多特点，充分认识民族独立解放战争的规律，发扬我党我军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传统和善于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优长，以超人的胆略，在敌人以锐不可挡之势对正面战场实行战略进攻时，指挥所属抗日武装实行战略上的敌进我进，以有限的兵力，大胆挺进敌后，经过艰苦奋战，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开辟和巩固了对敌人构成致命威胁的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形成夹击敌人的战略态势，从而挽救了抗战危局。

由此可见，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伟大创举，其独创性主要表现在开辟敌后战场。

二、统一战线在战略布局上的成功体现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形成两个战场的前提。没有统一战线，就不可能有举国一致的抗战；没有举国一致的抗战，也就不可能出现统一战略目标下各自独立的两个战场。

两个战场是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相互配合，相互协助的”，“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①]。统一战线内的这种分工，既符合全国抗战军事战略上的需要，又符合国共两党和两军的自身情况。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控制全国资源，拥有 200 余万人的正规军，且装备水平远远高于我军，理所当然地担负正面战场的正规战；而我军数量少、装备极差，但素质高，善于做群众工作，长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独立作战和生存能力强，适于担负开辟敌后战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所以这样分工是统一战线在军事战略布局上最为成功的体现。两个战场缺一不可。两个战场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以打击共同的民族敌人为统一的战略目标；然而又必须保持独立性、自主性，形成既统一又独立的局面。在独立与统一的矛盾中，统一是矛盾主要方面。统一是为了民族解放大业，独立是为了对付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和坚持抗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正确地处理这一关系，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事磨擦中，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既维护了统一战线，又坚持了独立自主，使敌后战场得以巩固、扩大，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正面战场，成为战胜敌人的决定性战场。

①《毛泽东选集》第 2 卷，1991 年版，第 553 页。

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构成了有利的战略布局。全国抗战开始,我、友两军主要是战役上的配合。在敌军长驱直入,友军败退之际，八路军挺进山西前线，首战平型关，歼敌精锐 1000 余人,取得全国抗战后第一个大胜利，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接着,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在同浦路北段和正太路上沉重打击敌人,掩护友军的退却。太原失陷后,友军南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八路军为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展开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山西为主的敌后战场。尔后，依托山区,发展平原,迅速扩展到晋、察、冀、绥、鲁、豫等省广大地区，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在华中，当敌军攻占上海、南京继续西进之际，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配合友军作战，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在华南，当敌军攻占广州和海南岛时，我党领导的东江、珠江、琼崖等抗日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形成华南敌后战场。东北抗日联军在七七事变前后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东北敌后战场，牵制日本关东军，对关内抗战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

四大敌后战场的形成，是我党我军实行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坚持持久战，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以及广大军民英勇奋斗的结果。

敌后战场形成之后，在战略上积极地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这种配合、支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战行动上的配合、支援、策应。当正面战场友军与敌军进行徐州、武汉会战时，我八路军以主力一部挺进冀鲁平原,牵制敌第二军,威胁其后方,分散其兵力 同时,以晋冀豫、晋察冀边区部队破坏平汉、津浦的铁路交通,以支援正面战场。特别是 1940 年 6、7 月间当敌人加紧政治诱降，并攻占宜昌，造成溯长江而上威胁重庆之势时，八路军于 8 月在华北敌后

战场,发动了有 105 个团 20 万人参加、战线长达数千里、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时间长达 3 个多月,歼灭敌军 4 万多人,瘫痪了敌主要交通线,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身上,减轻正面战场压力,极大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对此,蒋介石在给八路军嘉奖电中也不得不承认“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①]。此后,敌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兵力加强其华北方面军的力量,对付八路军。1944 年春,当敌人发起“一号作战”,打通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的交通线,正面战场友军又一次败退时,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对敌发起强大攻势,实行局部反攻,有力地打击牵制了日军,使沿平汉路南下的华北日军,在打到平汉南段之后,不得不回师华北。这些都是在战略上对正面战场的有效配合和支援。

二是战略、战役指导上的磋商与建议。抗战开始,当国民党当局确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部署时,中共中央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并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积极建议全国抗战应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外线速决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原则。当友军与敌人进行忻口、太原会战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向友军第二战区领导建议:加强娘子关和龙泉关的防守,指出这是保卫太原和山西腹地的关键所在。并提出战役部署上应将主力置于两翼,一部扼守正面阵地。然而,这些正确建议并未被接受,因而,导致敌人突破娘子关,威胁太原侧后,造成全线溃退、太原失陷的危局。在正面战场第 5 战区进行徐州会战时,周恩来、叶剑英积极向李宗仁、白崇禧建议 在津浦路南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阻敌北上;在津浦路北段,以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并派张爱萍到徐州向李宗仁进一步阐明这一战役指导方针,得到李宗仁的赞同,从而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此外,中共代

① 1940年 9月25 日《新中华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表周恩来、叶剑英还在国民党南岳军事会议上，介绍敌后战场抗战、特别是游击战的经验，并协助国民党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游击战的指挥员。

诚如毛泽东指出的：“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①。因而，正面战场对敌后战场的配合、支援也是比较好的。战争初期正面战场作为敌人主攻目标，抗击了敌人的主要兵力，客观上起到了掩护我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的战略配合作用。在敌后战场形成之初反击敌军围攻的作战中，国民党军或直接配属我军参加反围攻作战，或作间接的配合，都曾起过积极作用。1938年2、3月间，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反击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围攻的作战中，得到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的积极配合，从而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并收复县城7座。4月，八路军总部指挥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和山西新军一部，在配属的国民党军2个军另3个师的积极配合下，粉碎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并收复县城18座。对配属我军作战的国民党军，毛泽东曾明确指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指挥员：“应采取爱护协助的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任务。……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② 这与蒋介石牺牲他人、保存自己实力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在其最高当局消极抗战的错误政策指引下，“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退了袖手旁观”，但它仍然牵制日军兵力30—40%，这对敌后战场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

正是由于两个战场的战略布局和战略防御阶段相互积极配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版，第941页。

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0页。

合，从而陷敌于两面作战、腹背受击的被动局面，使抗日战争经过15个月就迫使敌人停止战略进攻，放弃速战速决，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从此,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三、不同的战略指导，导致两个战场主次地位的变化

在全国抗战爆发到武汉失守的战略防御阶段中，正面战场抗击着敌军的主要兵力，是全国抗战的主战场。然而，在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主客观原因，正面战场降为次要战场，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两个战场主次地位变化的客观原因是敌人战略重点的转移；主观原因是两个战场采取不同的战略指导，这是导致主次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两个战场主次地位变化的客观原因：

七七事变到武汉、广州失守的15个月中，由于日本侵略者以正面战场为战略重点，集中力量对正面战场实施战略进攻，企图打垮国民党军，摧毁中国人民抗战意志，从而达到速战速决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战争目的。这样，正面战场就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然而，日本由于其综合国力先天不足；加之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益显兵力不足;以及战争的非正义性,遭到国际、国内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特别是遭到中国军民在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上的沉重打击，使其付出重大消耗和损失。15个月战争伤亡人数累计达44万,消耗资财近100亿日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广大军民，在其后方开辟了广阔的战场，对其构成致命威胁，迫使它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转移其主要力量用于攻击我敌后战场，战略重点转向我党我军。这样，坚持抗日的重担就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肩上。敌后战场也就逐步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

（二）两个战场主次地位变化的主观原因：

正面战场由主要战场降为次要战场，原因诸多，但主要是由于蒋介石缺乏抗战的坚定性和战略指导上的错误。

首先是缺乏抗战的坚定性。全国抗战爆发前，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误国政策，对日本侵略一再忍让，不加抵抗，以致丢掉东北四省，使华北、华东大门洞开。西安事变后，虽被迫转向抗日，但仍犹豫于和、战之间。七七事变后，在国人和敌人双重压力下，决定抗战，但并不坚定，其间几度与日本秘密谈判。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才正式与日本宣战。

其次，是战争指导上的错误，蒋介石一向害怕人民群众。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对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行抗战的请愿示威群众说：抗战是政府和军队的事。全国抗战开始后，担心群众动员起来如要求民主会危及其独裁统治。因而，推行一条单纯政府的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甚至压抑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淞沪会战，上海人民在共产党组织下支援前线许多食品物资，而前线将士却忍饥挨饿浴血奋战。正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① 正面战场所以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由主要战场降为次要战场，根源在此。

蒋介石一向抓住军权不放，但他却不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所以在战场指导上，谬误百出，屡遭失败。抗战伊始，虽然确定了以“持久消耗”为战略方针，但如何进行持久战却无定数。战略上是内线持久防御，战役战斗上依然是内线持久防御；战略上是消耗战，战役战斗依然是消耗战；轻视运动战和游击战，一味坚持单纯的呆板的正面阵地防御，把大部和几乎全部兵力用于正面防御，很少在敌之翼侧和后方实施反击，完全陷入被动挨打地位。所以，许多重

①《毛泽东选集》第 2 卷，1991 年版，第 375 页。

大战役屡屡以丧师失地而告终，战局一再危急。

国民党作为执政大党，国民党军作为拥有数百万人的大军，在蒋介石领导下，却难于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蒋氏不仅战略指导不容他人染指，就是战役甚至有些战斗他也要干预。越级指挥是蒋氏的固癖。淞沪会战，他可越级调动一个炮兵连，引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极度不满。长衡战役开始，本来战区指挥得当，打得不错，然而蒋氏却“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①]，致使战局急转直下，由胜局转为败局。

第三，最主要原因是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蒋介石在日本诱降,英美劝和的影响下,开始把它的主要矛头由对外转向对内，抗日逐渐消极，而反共却日趋积极，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并派遣游杂武装返回敌后，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搞军事磨擦，争夺地盘。不仅如此，其所属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日军,充当伪军,与日军协同进攻我军和抗日根据地。自 1938 年 10 月至 1944 年春,日军对正面战场只进行了 10 余次有限攻势。而正面战场数百万国民党军，除 1939 年主动发起一次有限的冬季攻势和以一部兵力组成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外，从未再主动进攻敌人。尽管敌人以主要兵力压在敌后战场，敌后战场处于极端困难时期，它也无动于衷，从未采取策应敌后战场的作战行动。特别是 1944 年日军发起“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交通线时，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再次溃败，丧失大片国土。这足以证明国民党正面战场已失去主要地位，降为次要战场。

敌后战场上升为主要战场，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战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正确的战略指导和全体军民艰苦奋斗的结果。

首先是实行“全面全民族”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动员教育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援战争，实行正确政策，建立抗日民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40 页。

主政权，组织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充分调动广大人民抗战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父送子、妻送郎，母亲叫儿打东洋”的群众抗日热潮，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敌后战场逐步成为主要战场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毛泽东高瞻远瞩以其伟大战略家的智慧，根据战争双方的基本特点，不仅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而且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战发展三阶段的战争进程，解决了如何进行持久战的一系列重大战争指导原则；明确指出战略上的内线持久防御战，战役战斗必须是外线速决进攻战；战略上持久消耗战，在战役战斗必须是歼灭战；并且正确解决了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在战争不同发展阶段的地位作用。这些都是正面战场统帅部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根据敌、友、我三方面的实际情况和不同特点，特别是我党我军与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和善于进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与建立根据地的优点，作出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的英明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不仅关系抗战胜利前途，而且对敌后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也具有决定意义。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我军战略方针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执行创建抗日根据地，消灭与牵制敌军、积极配合友军作战，壮大发展抗日武装等战略任务。我党我军正是坚决贯彻执行上述路线、方针、任务，经过 15 个月英勇奋战，在华北、华中建立 10 余块抗日根据地，形成广大的敌后战场；我军也由出师时 5 万余人发展到 18 万余人，对敌人构成严重威胁，迫使敌人停止战略进攻，从而加速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为抗击敌人把战略重点转向我敌后战场，作了物质、精神的准备。

第三，确定正确的战略部署，逐步实施战略展开，扩大敌后战场。我军挺进敌后之初，首先是控制山区，尔后向平原发展。在山西，八路军依托几大山脉控制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先后开辟

了晋察冀边、晋西北、晋冀豫边、晋西南四块抗日根据地。尔后，依托这些山区根据地向冀鲁平原发展，最后开展了晋、绥、冀、察、鲁、豫6省广大地区。在华中，新四军首先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和依托大别山开辟皖中、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尔后东进北上，开辟苏北、皖东，展开于苏、浙、皖、鄂大江南北广大华中地区。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际，党中央和毛泽东又根据敌、友、我三方情况和敌后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任务；并根据这一任务调整战略部署。决定八路军三个师主力，挺进冀中、冀南和山东，以巩固平原根据地和发展壮大自身。为了发展华中，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决定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南下，新四军江南主力北上，共同开辟苏北，打通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的联系，以适应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我党我军面临敌、顽夹击的新形势。由于适时调整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既定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因而保证了我党我军在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下，仍获得大发展。到1940年百团大战前，我军已发展50余万人，根据地人口近1亿，敌后战场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所以，能够抗击60%以上的日军和100%的伪军，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

第四，因应形势，即时采取对策，战胜极端困难，巩固敌后战场。由于日本南进准备发动和进行太平洋战争，企图变它在中国的占领区为进行大战的后方基地。所以，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日军以其70%以上兵力和全部伪军，加紧对我敌后根据地的疯狂“扫荡”、“清乡”、“蚕食”、“治安强化”和实行“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敌后战场。与此同时，国民党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制造了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使敌后抗战陷入极端困难境地。为了战胜敌顽夹击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极端困难，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十大政策”。敌后战场军民坚决执行“十大政策”，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发挥党、政、军、民整体力量，开展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全面的对敌斗争。在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的作战指导方针，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织武工队深入“敌后之敌后”,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变被动为主动。同时,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加强民兵、游击队,形成主力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以适应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需要。在政治上,加强根据地‘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加强对敌人特别是对伪军政治攻势,这些都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尤其在反击顽固派的斗争中,采取政治攻势为主,军事反击为辅,先礼后兵,坚决揭露顽固派挑动内战、破坏抗战的阴谋;在军事反击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维护了统一战线,争取了广大的中间派,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不反击顽固派,便无从坚持抗战。在经济上,掀起大生产运动,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基本解决了战争的物质需要,并减轻了人民负担。在思想上,加强对军民形势教育,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从而使全党全军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

由于敌后战场军民坚决执行上述“十大政策”,因而经过三年艰苦斗争,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进入了恢复再发展时期。这是敌后战场作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在抗战最为关键的时期所起的关键作用。

第五,敏锐观察战争形势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率先发起反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先后要求全党全军密切注意战局发展,抓住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遵照中央和毛泽东上述指示,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于 1943 年 8 月发起卫(河)南、林(县)南战役,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1944 年 4 月 18 日,日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22 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应乘敌南犯空虚之机,迅速向豫北、豫西进军。遵照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在整个华北战场上,展开声势浩大的局部反攻,先后进行了 5 次大

规模攻势作战。与此同时，新四军在华中战场也发起了反攻，先后进行了车桥、高沟杨口、阜宁等战役。华南各抗日武装也相机对敌展开攻势。至 1945 年夏,敌后战场我军共歼敌 47 万人,攻克县以上城市 70 余座，收复国土 32 万平方公里，为全面反攻作好了准备。在此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还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各以主力一部转入战略的外线作战，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进军，支援友军，建立全面反攻的前进阵地。1945 年 8 月,在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时，党中央命令敌后战场军民即时发起全面反攻,先后歼敌近 40 万人,解放城市 250 余座，收复华北、华中、东北大片国土，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纵观两个战场地位升降变化，不难看出，战略指导正确与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四、对抗日战争进程、结局和战后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刻影响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两个战场军民艰苦奋战的结果。两个战场同时存在,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其顾此失彼,从而由强变弱,由主动变被动。八年来，两个战场共进行重大战役 200 余次,大小战斗 20 万次,共歼日军 150 余万人、伪军 118 万人,接受投降日军 128 万人、伪军 146 万人,[①]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一洗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不难想象，如果只有一个战场，那么敌人就可毫无顾忌地集中全力于一线作战，并且可以充分利用其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资源，不断增强其战争力量，实现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果如此,那么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当是另一种情形。当然，两个战场的配合并未尽如人意。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保

①《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624—625 页。

存实力、准备内战的反动政策，因而正面战场未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并且不断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进行武装磨擦，从而使敌后战场军民在担负抗击日伪军的主要兵力的同时，还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如果没有国民党顽固派造成的内耗，可以想见，抗日战争的进程当大为缩短，国家民族的损失当大为减少。

两个战场不仅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战后中国的前途、命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两个战场实行不同的战略指导，因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敌后战场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因而，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越战越强，从敌人手中夺回达 10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解放人口 1.2 亿，主力军由出师时 5 万人发展到 120 余万人，民兵达 260 万人，不仅在夺取全民族抗战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为抗战胜利后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奠定了胜利基础。反观正面战场，由于其最高当局推行错误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因而愈战愈弱，由主要战场变为次要战场，在八年抗战中丧失国土达 279 万平方公里，使国家民族遭受惨重损失，作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是难辞其咎的。人民赢得了战争，战争教育了人民。中国人民从抗战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把国家、民族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身上。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抗战胜利后由其挑起的内战中遭到惨败的种子，早在抗战中就由他自己埋下了。

两个战场功不可没。两个战场军民高度发挥爱国主义精神，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支援下，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同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伟大贡献。两个战场抗战的历史昭告我们：一个国家、民族要战胜强敌，要独立、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团结一致，同舟共济。（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论敌后抗战的军事战略指导

周　小　宁

军事战略指导的正确与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军事战略错误,整个战争未有不失败的。敌后抗战，其困难和复杂性远远超过一般的战争，要从被动中争取主动，由劣势转变为优势，更加离不开高人一筹的军事战略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始于劣势，终于全胜，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就是人类战争史上实行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的光辉典范。它对现在和将来的国防建设、军事斗争仍然具有启迪意义。本文试图就我党我军敌后抗战的军事战略指导的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准确、深刻地把握敌后战场的基本特点是实行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的基本前提和依据

“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① 不了解敌后战场的特点，就不能指导敌后抗战走上胜利的途径。正是敌后战场敌我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敌后抗战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具体指导原则和对策。那么，八年抗战中敌后战场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①《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991 年版，第 173 页。

第一、敌强我弱差距悬殊，日军擅长正规战，我军擅长游击战。

日本是东方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组织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二号法西斯强国。它工业技术先进，经济发达，军队武器装备优良,弹药充足,官兵训练有素,战术技术熟练,战役、战斗组织指挥能力较强，在正规战中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相当深，作战顽强。我军政治素质高，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作战英勇，有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但出师之初，兵力少，武器装备比不上日军，与国民党军相比也有差距；随后，军队扩大，但武器装备除缴获一部分外，没有根本的改善，弹药补充供应不足。由于以上基本条件的制约，敌强我弱差距悬殊。

第二、战场地域广阔，山地利于我不利于敌，平原利于敌不利于我。

日军占地甚广，兵力不足，只能控制重要城镇、交通干线和部分乡村，空出了广大地区无法控制，这就给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以广大的活动地盘，使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具备了重要的乃至头等重要的一个条件。1940年11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共25万人，兵力密度为0.36人／平方公里,其第12集团军,在每隔18公里的一个据点里只驻有20人。[①] 1941年底，日军华北方面军占领427座县城，[②] 兵力仍为25万左右,平均每县驻有日军580人左右。

由于兵力不足，就造成了日军顾此失彼的矛盾，而便利了我军的相互支援和配合。日军往往只能集中几个地区的兵力，对我一个地区进行围攻或“扫荡”，而没有力量同时大规模进攻各个抗日根据地。我则在打击敌人进攻的同时，趁机在敌兵力空虚的各地区发起袭击和破袭,粉碎敌围攻和‘扫荡”。在大战略区之间,也是如此。

①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320页。

②《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就华北、华中相比较而言,它更重视华北,对华中的‘扫荡’一般不如对华北那样严重。就是因为,“八路军在华北的坚持予新四军有掩护作用,正如苏中、苏南的坚持予华中全局支撑点的作用一样”。①

在山地作战中,我军相对主动和有利,能给敌人以较大的打击和部分的歼灭;在平原大股歼敌较为困难。八路军冀南军区 1940 年的军事报告写道:在日军据点林立、增援迅速、火力猛烈的冀南平原上,我军‘1个团(1000 战斗员左右)可打退敌人 1 个连(250 人左右),但是很难歼灭’。

第三、环境极其复杂。

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分别担负正面、敌后两大战场的抗战任务,形成了夹攻敌人的最有利的战略格局,以及史无前例的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之间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这种犬牙交错还表现在敌后战场各方力量的分布上。在敌后战场,不仅有敌我双方,还有国民党友军存在,敌方内部又区分为日、伪两个方面,这就形成了日、伪、国、共四方犬牙交错的极其复杂的局面。总格局是国共联合同日伪斗争。但友军国民党是我军过去的敌人,它对我军仍然怀有敌意;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并未消灭,有时还相当尖锐,而敌后又是国共矛盾表现最激烈的地方。

第四、人民战争与日伪‘总力战’的较量。

敌后的一些地区,如鄂豫边区、琼崖,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苏区;敌后的绝大部分地区虽然不是老苏区,但在抗战之前也已有我党一定的政治工作、群众组织基础。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战争,社会基础更为广泛,最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和参加战争。我党我军天然是敌后抗战的领导者,这是因为我党我

① 1944年初陈毅关于 1938—1943 年华中工作总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